

国家安全视角下澳门特区青年国家认同研究

张树剑 钟楚帆 黄卫平

摘要：在澳门维护国家安全体系的制度化建设过程中，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为意识形态的稳定起到了支撑作用。但是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构建工作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如青年对于西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过度追求、青年群体政治参与意识与本土意识的崛起、部分青年对国家及特区政府的认同感逐渐下降等，这都给国家安全的维护和澳门社会的繁荣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在当今不断变幻的国际局势下，中央及澳门特区政府需要把握好澳门青年的意识形态动向，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国安宣传、法治教育等多方面协调推进，强化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与国家安全意识，以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安全风险与挑战。

关键词：一国两制；国家安全；澳门青年；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D432.6;D67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1) 06-0095-07

国家认同，是一国国民最基本的身份认同，也是人类生产生活中形成诸种群体认同中的最高形式归属。大力推行国民教育是各国提升国民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最基本乃至最重要的方式。^[1]澳门回归以来，中央及特区政府在积极推动“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时，对澳门居民的人心回归工作一直保持高度关注，不断推进“爱国爱澳”教育及国家认同感培养，构建了多元立体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澳门居民有较强的国家认同感及国民意识，较强的青年国家认同意识是澳门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亮点。但回归以来过于依赖博彩业而导致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不仅制约了澳门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对澳门青年的人生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近年来部分澳门青年开始出现国家认同及国家安全危机端倪，国民意识培育和国家认同建设工作面临较大挑战。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下，需要进一步强化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为澳门青年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从而有效应对国家认同危机挑战，为特区维护国家安全体系的制度化建设

本文为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项目“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2020GXJK031)阶段性成果。

提供内部动力。

一、澳门青年国家认同的构建维度

国家认同一般可分为国家政治认同和国家文化认同这两方面，两者共同构建了民众对作为政治共同体和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归属感。^[2]其中，政治体系作为国家政治认同的对象，可看作是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规范、政治组织结构、政治行为“四位一体”的结构。文化认同则是一群人由于分享了共同的历史传统、习惯规范及无数的集体回忆所产生的认同感。而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3]因此，国家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对于国家认同的稳固起到了支柱性作用，缺一不可。

（一）国家政治认同层面

政治认同是对政治体系的认同，而政治体系是指政治行为体所赖以存在的制度形式，是政治行为主体与政治制度的有机统一。政治统治中的权威与服从关系是政治权力追求的重要目标，只有当社会成员选择政治服从行为时，政治权力制约关系的同一性才得以存在，政治权力才是有意义的。在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的形成过程中，“承认、认可、同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因此，青年群体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意味着对于国家制度体系及其所主导的价值与原则的认同，有助于其在政治行为上的配合。

同样，政治体系的认同危机包括对制度的认同危机以及对国家和政府权威的认同危机，这种危机一旦产生，政治认同主体就开始对现行政治体系所主导的价值和原则持有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在行动上表现为不予合作、反对甚至直接对抗。^[5]无论是在我国港台还是在澳门地区，少数民众包括青年一代将西方民主制度视为真正的民主，把定期的多党竞争性选举视为民主制度的衡量指标，反映了国家制度层面上的认同缺失。对于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和政府权威的认同下降弱化了澳门青年的政治认同，从而容易造成青年政治行为的非理性化。

除此之外，政治意识的代际转换在不断地消

解政治认同。在澳葡统治时期，澳门的爱国爱澳社团在保障华人居民合法权益的同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自治，联合制约澳葡殖民势力；^[6]在澳门回归祖国初期，澳门爱国社团长期的“拟政府化”运作催生了以爱国社团领袖和骨干为主体的具有管理经验的社会治理人才，为特区政府迅速组织和建立起有行政经验的公务员队伍提供了基础。老一辈的澳门民众由于与内地渊源深厚，政治意识也很大程度上与过去的经历有关，对大陆有很深的认同和感情。但是随着代际的更替，青年一代并没有在大陆生活的经历，国家政治认同意识基础的逐步消解导致青年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下降及本土意识的上升。

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受到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动、精英势力的鼓动等多方面影响，其与国家政治认同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前些年自由行的继续深入与博彩业的不断开放，澳门开始进入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社会关系持续调整、社会矛盾开始凸显的关键转型期，居民从回归后相对安定富足逐渐转入到不得不面对各种社会压力的生活状态。^[7]在对于民生与民主事务不断增长的迫切需求推动下，澳门的青年社团主导的青年社会运动及政治参与亦蓬勃发展，但在这背后的部分澳门青年的非理性政治认同愈加显著。在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上，澳门青年整体上比较理性和客观，但中立立场以及无立场的澳门青年个体依然存在，一些青年愿意包容甚至参与反对派推动的非理性激进社会运动。^[8]

对于民主价值的追求在国家政治认同层面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澳门青年社团渲染民主价值的重要意义及实现必要，对青年的价值取向及国家认同意识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社会的多元化导致诸如自由、民主、法治、秩序、国家安全等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对青年持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要进行积极引导。但是，在价值发生冲突时，各种价值需要得到平衡从而实现社会的动态和谐。然而部分青年受到激进思想的灌输，错误地将上

述价值进行割裂理解,不论具体的实际场合认为自由高于秩序、民主优于理性,从而做出非理性的政治行为,造成国家制度体系认同的缺失,影响国家政治认同的构建。一些澳门青年对于西式民主的追求加上国家政治认同意识的不足,使其对于中央依法管治澳门产生了抵触,造成他们对于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采取消极态度,又反过来削弱了他们的国家政治认同。

(二) 国家文化认同层面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语言以及所处地域的不同,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会形成多种围绕自己族群或者地域的文化认同,因此国家内部文化认同的多元化成为许多国家的普遍现象。^[9]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把握好对本民族或地域文化认同和对主体文化认同的主次关系。由于长期共存于同一国家内部,不可分割的政治实体形成的同时也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在认同地域文化的同时,形成主体文化共识十分必要。若对亚文化的认同过高而忽略主体文化共识的构建,就会给国家的长期稳定造成隐患,甚至出现分离主义的倾向,也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利用从而威胁本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国家主体文化的传扬对于澳门青年国家文化认同的强化极为重要。

由于澳门回归前长期作为殖民地,殖民教育的痕迹较为明显,澳门青年在国家认同意识方面比较淡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较少。在澳门长期的生活也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本土意识,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生活习惯产生了惯性依赖,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更为强烈。与此同时,时代的不断更替也使得人口的本土化难以改变,青年一代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更多来自于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而对中国的革命文化和当今的社会主义文化知之甚少甚至排斥。由于历史原因,澳门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聚集地,其教育体制具有自由化、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10]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注重中华文化遗产的多元化教育使得“爱国爱澳”成为法律倡导、实践践行的主流价值观,同时也实现了澳门多元文化的延

续。但是澳门社会中的中华历史文化认同随着代际更替正在逐渐弱化,新一代澳门青年对了解国家历史、文化与国家发展现状也没有较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多元文化竞相发展的澳门社会,国家主体文化显得并不突出。

回归后的澳门教育法律制度调整了原有的教育模式和理念,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融入国家发展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11]对回归前复杂的教育格局进行了规范整合,以利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顺利融入。通过对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师资队伍管理等进行具体法律规定,切实规范教育活动,科学合理地引导青年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较好地实现了国家文化认同的培养,为实现澳门持续繁荣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但在新形势下,澳门青年更需要对最新国情包括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香港局势的动荡、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进行客观深入的了解,为国家成就而自豪、为国家发展而献力,从而不断强化其国家认同。

二、“一国两制”的实践传统与国内外发展新形势

(一)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及新形势

“一国两制”是改革开放后新一代领导人关于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实践证明,“一国两制”这一创新性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在澳门特区,具有优良爱国传统的澳门同胞在回归后保持较高的国家认同感及民族自豪感,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根基,确保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秩序牢固确立。澳门特区将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维护了宪法与基本法作为特区宪制基础的地位,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区宪制义务。在回归十周年之际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法》,回归二十周年前夕又成立了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统筹协调澳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工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表述,充分肯定了澳门特区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对于特区维

护国家安全立法与实践所积累的经验。

然而,面对国际国内局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行政区一方面在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另一方面更为棘手的是可能形成国家安全的漏洞。近年来香港社会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家安全和特区政治制度的事件,给港澳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敲响了警钟。港澳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化体系亟待构建。

(二) 澳门青年国家认同新动向

澳门特区作为“一国两制”的实践地区,具有其他地方区域所不具备的特性。无论是在回归前或是回归后,澳门都充斥着多元化的经济和社会氛围,与国际大环境有着深刻而密切的交流与联系。澳门促进了国家整体的对外交流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使得澳门更加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变动的影响。

相较于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危机程度并不显著,澳门在青年国家认同培养中已经获取了一些成功经验。台湾青年中的国家认同缺失已然表现为国家认同的混乱,而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缺失则表现为对比起国家认同更加看重香港认同。^[12]在与青年国家认同培养密切相关的爱国教育、青年政策方面澳门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也得到了提高。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构建了一整套旨在培养青少年“爱国爱澳”核心价值的教育体系,^[13]对于澳门青年国家认同的培养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可忽视的是,作为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群体,直面澳门社会结构转型下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使得青年群体受到冲击,对于各种民生、民主事务的解决具有一定诉求。同时,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渗透、港台社会运动的辐射下,部分澳门青年的观念意识被其言论及行为所影响,民主诉求激涨、政治参与意识崛起、对国家及特区政府的认同感下降。

不可否认的是,在新形势下,澳门青年的国

家认同面临着风险与挑战。澳门教育暨青年局在2018年进行的青年指标调查中,新增了青年家国情怀及对中华文化认同等内容。调查结果发现,66.00%受访青年“尊重国旗和国歌是公民的基本态度”,60.69%认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得以传承和发扬”,52.59%同意“国家发展和个人息息相关”,48.91%同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澳门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继续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另外有46.3%同意“国家今天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数据反映了受访青年有较强的国家认同及爱国情怀,但仍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三) 反动势力渗透下澳门青年国家认同面临挑战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直接影响包括经济下行、人员病亡、国际间交通受限等,再加上中美两大国家间关系不断起伏等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动所造成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使我国特别行政区处于国家间博弈的风口浪尖,吸引着国内外多方势力的关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图通过煽动制造港澳台地区的混乱和斗争对中国造成分裂和打击,对国家统一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价值观尚未完全建立、意识形态更易受到外在干预的澳门青年,成为国外势力向澳门渗透的首要对象。

在澳门赌权开放过程中,随着美资大举进入澳门博彩业市场并迅速崛起,其市场份额和话语权大幅攀升,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开始在政治上谋求影响力,干扰澳门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对澳门的繁荣稳定及国家统一、安全造成隐患。2005年的澳门第三届立法会选举,就被认为是“澳博”与“威尼斯人”角逐澳门政坛的前哨战。^[14]在老一代爱国爱澳社团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新一代的澳门青年社团开始直接而深入地影响澳门政治。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反动意图将通过其扶持的代理人传递给新一代的澳门青年,对于国家观念、国家认同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年群体造成负面影响。

由于一些澳门青年对一些民生和民主事务的诉求难以通过建制内的沟通渠道得到有效表达与反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认可制度外的利益表达途径,包括反对派组织的激进社会运动。部分澳门青年的非理性政治认同还体现在对于网络上激进青年社团的言论不能理性看待,未能正确认识和理解“一国两制”制度,并对其动员的明显违反基本法或社会规范的行为予以响应。一些年轻人对一些媒体及言论的追捧也显示出其对于“一国两制”及宪法和基本法下的特区政治制度的不了解。

三、国家安全视角下的青年国家认同构建

如何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为特区维护国家安全体系的制度化构建提供内部动力和文化根基,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更新国家安全理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对香港、澳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增强香港、澳门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15]对于公职人员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以及国家意识的培养毫无疑问是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化力量构建的重要基石,而对于广大澳门青年的国家安全教育,更是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通过宣传教育使澳门青年认识到澳门正在面对各方面的国家安全挑战,包括内部与外部、传统与非传统、人为与自然等因素。作为“一国两制”实践区,澳门与内地及国际的交流互动都十分便利,这一独特的发展优势也造成了澳门维护国家安全的复杂与高难度,必须做到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并重。除此之外,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生物安全、国家认同挑战下的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都属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一部分。因此,构建澳门青年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深化其国家安全观念、强化其国家认同、巩固维护国家安全体系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加强制度建设,拓展青年发展空间

在政治认同层面,国家需要不断进行制度优化,提高澳门青年对于国家制度的自信;从政策制度上推动澳门经济多元发展,为澳门青年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同时引导澳门青年的理性政治参与,并为其与政府之间进行沟通提供更通畅的对话渠道。

澳门在回归之后,短期内较难自主摆脱殖民烙印,对西方制度及价值观的崇拜与追求需要在内地的积极引导下得以逐渐消除。中央与特区政府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从实际出发,培养澳门青年的国家制度认同。澳门特区政府要进一步扩充体制内的政民沟通渠道,为澳门青年的民主民生诉求提供足够的合法表达途径,引导澳门青年理性进行政治参与。对于澳门青年迫切的民生诉求,特区政府更应该凝聚社会共识,坚定制度自信,充分展现制度优势让澳门民众共享发展红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而赢得澳门青年对国家制度的认同。

(三)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树立青年文化认同

在文化认同层面,澳门特区政府在继续推进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中华历史文化教育的同时,要加强对国家发展现状如当今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等内容的全面教育。对国家国情的清晰认知,是澳门青年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构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6]对于澳门青年而言,对国家发展现状缺乏了解会导致其对国家制度体系、发展道路的不信任,从而造成其国家认同的下降。因此,中央和特区政府需要加强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引导,让澳门青年“听得清”和“听得进”中国声音,清晰、完整、准确地传达中国立场和中国观点。善用事例,从而广泛宣传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搭建沟通桥梁,从而深入开展内地与澳门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

建立建强人才队伍,从而全面提升传播效能;加强组织领导,从而为传播能力建设提供组织保障。总而言之,创新方式方法、提高组织效能、结合历史与现实进行宣传教育从而开展文化认同构建,是当今澳门青少年国家认同强化的重要方向。

(四) 推进法治教育,巩固国安思想根基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青年国家认同教育不能止步于国安知识的宣传教育,更应涵盖在青年国家认同和国家安全意识培养上起到关键作用的国家安全法治教育。国家安全法治思维,为澳门青少年维护国家安全意识的培育提供思想基础,为澳门维护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提供文化根基。

青少年法治教育并不是专业学习,而是一种素质教育,目的是通过对法治精粹的了解和领悟,形成、改造自己的价值观,成为一个有国家意识和公民观念的现代公民。^[17]关于澳门青年的国家安全法治教育,首先是对于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法律体系及执行机制的普及教育。对于澳门特区政府在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宪制义务这一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及发挥的效用,澳门青年应有深入了解。澳门青年也应该对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防范作用有所了解,认识到在港台社运频繁爆发的环境下对于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性,以及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制体系及执行机制构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预防与坚决惩罚。

其次,应发挥案例教育在国家安全法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在对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经验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不可忽略“台独”“港独”思潮及其引发的危害国家安全社会事件这些反面案例的教育作用。在认识到中央及特区政府推进国安体系构建的决心及实践的同时,澳门青年也要对法律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进行深入了解,知道何事不可为何事可为。最重要的是,在国家安全法治教育的过程中培养澳门青年的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其独立的法治思维和判断能力,使澳门青年认识到,国安法并非对公民正常权利的侵害,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前提下,澳门居民的正常权利都能够得到充分保障。

在国家安全法治教育中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方式方法。在舆论宣传方面,网络等新媒体的受众则大多数是青年群体,网络环境对于澳门青年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澳门特区政府也需要运用网络等新的传播媒介以青年一代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工作。

总的来说,对于澳门青年的国家安全法治教育,方式方法上多采取实践式、体验式、参与式等教学方式,内容上与法治事件、现实案例、常见法律问题紧密结合,重视澳门青年的参与、互动和思辨,创新形式,从而切实提高法治教育的质量和实效。

参考文献:

- [1] 康玉梅.“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民教育与国家认同[J].环球法律评论,2018,40(2).
- [2][5][9] 张建,包玉婷.反分裂斗争中的国家认同建设研究——以港台地区为例[J].台湾研究,2021,(1).
- [3] 李捷,杨恕.国家认同危机与认同政治——国家统一的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5(2).
- [4] 彭正德.论政治认同的内涵、结构与功能[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43(5).
- [6] 许昌.论澳门特区政治体制设计原则及顺利落实的成因[J].港澳研究,2015,(2).
- [7] 邹平学.强化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观,积极融入大湾区建设,为澳门青年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J].青年发展论坛,2019,29(6).
- [8] 林伟,肖莉.澳门青年政治参与的变化及对策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7,(7).
- [10][11] 张一鸣.依法治教与澳门青年国家认同[J].青年发展论坛,2019,29(6).
- [12] 李龙.港台青年中国认同缺失问题之比较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5,(7).
- [13] 常乐.教育政策与青年国家认同:“一国两制”的澳门范例及经验[J].深圳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版), 2020, 37(1)。

[14] 于欣. 论美资博彩企业对澳门政治生态的影响及法治应对之策[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32(3)。

[15] 新华网.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11/06/c_138532143.htm, 2020-02-29。

[16] 新华社.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361126882349267&wfr=spider&for=pc>, 2021-06-01。

[17] 江必新. 青少年法治教育需要进行“五个转变”——兼评《中小学法治教育读本》[J]. 中国司法, 2017, (9)。

作者: 张树剑,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钟楚帆,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助理

黄卫平,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 钟晓媚

(上接第65页)后监管机制。在设置综合执法权时, 应充分体现深化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对标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 将国际经贸领域中的重点监管方面, 如知识产权、劳动监察等领域纳入综合执法机制, 并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不同的行政权能。优化现有综合执法部门的衔接和沟通机制, 建立健全沟通协调和工作联动机制, 提升综合执法的合力和效率。

参考文献:

[1] 吴燕妮. 后冲突时代的国际法治和大国责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0-15。

[2] 袁曙宏.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N]. 光明日报, 2019-12-10。

[3] 张文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J]. 法学研究, 2014, (6)。

[4] 范宏云. 法治是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发展方向[J].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0, (4)。

[5]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6] 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2017年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状况[Z]. 2018-06。

[7] 袁晓江, 宫正主编.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与深圳实践[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9: 170-180。

[8]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法院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白皮书[Z]. 2019。

[9] 吴燕妮. 前海自贸区法治建设进路[J]. 开放导报, 2019, (2)。

[10] 吴燕妮. 全面开放新格局下前海法治建设进路[M]// 粤港澳大湾区法律体系构建.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0。

作者: 范宏云,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统一战线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

吴燕妮,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钟晓媚